【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研究专题】

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理与路径:基于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视角*

仝文涛 张鹏远 柳天恩

摘 要:东北地区与国内经济循环融合不深,是造成其经济振兴困难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点是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的抓手是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从供需两侧阐述东北地区产业链对接服务国家经济增长极实现振兴突破的理论机理。供给侧看,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实现创新要素逆向外包和嵌入生产配套协作,激发东北地区产业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需求侧看,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链接国内外市场、倒逼推进市场化改革,拓展市场规模,完善市场体制机制。进而,形成技术与市场的互促机制,推进东北地区产业全面振兴。文章进一步从市场份额演变、区际贸易联动和生产网络依存等角度论证东北地区产业与国内经济循环融合不深的事实及其影响。应从制度引领、市场改革、区域合作、产业互动、企业配套、干部交流等多个维度发力,推动东北地区产业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关键词:东北地区产业链;国家经济增长极;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015-11 **收稿日期:**2026-02-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北工业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基于价值链重构视角”(22YJC790116);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河北对接服务京津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BJ2026206);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青年课题“河北产业链嵌入京津创新链的机理与路径研究”(HBSKFZ25QN200);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科研专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溢出不对称的机制研究”(JXT2024ZD03)。

作者简介:仝文涛,男,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石家庄 050061)。

张鹏远,男,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通信作者(石家庄 050061)。

柳天恩,男,河北经贸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石家庄 050061)。

一、问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2023年9月7日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提出,“加强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促进东北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①]。这准确地指明了新一轮东北[②]全面振兴战略的方向和根本遵循,同时指出了过去和当前东北经济发展与振兴战略在连接经济循环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凭借较好的工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在国家战略[3]指导下，快速建立起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完备工业体系[4]，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5]。然而，改革开放后，东北经济快速衰落，主要表现为生产总值占比降低和工业企业的低利润高亏损现象[6]。

学界对东北问题提出多种解释理论，陈耀（2017）认为新东北现象是新阶段外部效应催化原有的结构和制度效应的结果。林毅夫等（2017）调研发现东北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轻重工业结构失调，表现出劳动力流失、产业集群失效和国企独大等问题。杨开忠等（2021）发现空间格局不经济是阻碍东北振兴的主要原因。李培林（2022）认为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双重路径依赖”限制了东北经济发展。林木西等（2024）总结新时代以来东北经济下滑的原因在于多年累积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和军等（2025）研究发现东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障碍在于体制机制、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等。赵杨等（2025）认为东北地区的困境在于路径依赖、制度惯性、市场失灵与地缘约束等结构性因素的叠加。赵彪（2025）研究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关键症结在于缺乏城镇的有效集聚、工业的实效载体和城乡一体化的纽带作用。已有的解释理论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依赖、产业结构偏重、人才外流、技术落后、国企占比过大、市场缺失等。这些理论从某些角度对东北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东北经济振兴政策的提出提供了参考与启示。然而，以上文献忽视了从经济循环和区域间产业互动演变视角展开研究。刘志彪等（2021）较为系统地论述东北脱节国内经济循环导致经济失速的理论机理。进一步，仝文涛等（2024）从国内产业联动角度实证了东北工业在国内价值链逐渐弱化，导致产业衰退的经验事实和作用机理。

要实现东北经济全面振兴，重新构建和强化其在国内外产业链上的紧密关联成为必要的途径。刘志彪等（2024）以产业分类施策角度提出构建东北产业链与国内外经济循环链接的政策建议。戴枫等（2024）从宏观上构建区域协调机制、中观上整合区内价值链和微观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三个层面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对接。然而，以上文献未能明晰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施政抓手，未系统论述融入机理与路径。文章以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为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国内外经济循环的关键手段，原因有三，其一，增长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赵祥，2024），构建其与东北的联动发展，能将东北带入发展的快车道，有效融入国内经济循环；其二，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经济增长极外贸出口额占全国比重近七成，东北企业如能成功加入其外贸产业链，将实现与国外经济循环的间接嵌入；其三，主动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能够倒逼东北完善体制机制，破解东北经济发展困境的路径依赖，有助于实现内生性的创新增长。因此，本文聚焦于东北地区产业链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理论机理和实现路径，以期为东北经济实现全面振兴提供一些政策层面的思考和启发。

二、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实现东北振兴新突破的理论机理

以东北地区产业链有效嵌入国家经济增长极为抓手，形成驱动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的内生动力机制，是推动东北振兴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步骤。本文从技术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侧两个层面阐述其中机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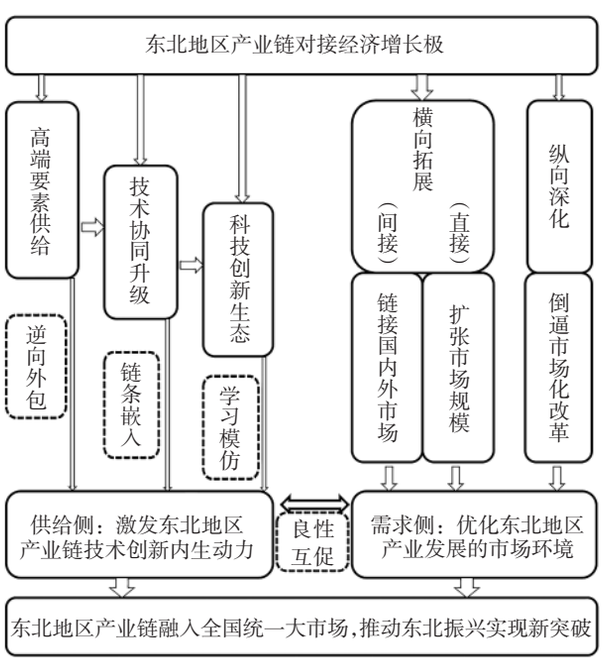


图1 东北地区产业链实现新突破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激发东北地区产业链技术创新内生动力

东北地区产业链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和京津冀等国家经济增长极,能够通过三条途径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形成内生性创新动力。其一,东北地区产业链能够利用逆向外包,弥补高端生产要素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其二,东北企业能够通过嵌入增长极产业链创新链,共享技术协同升级机制;其三,东北地区产业链能够模仿学习运用增长极成功经验,构建科技创新生态。此外,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路径间存在递进作用,高端要素的补充可以提升东北产业配套能力,促进企业有效融入增长极产业链条,强化产业共生,加速科技迭代,进一步,通过"干中学",借鉴发达地区经验教训,优化东北地区产业链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从根本上改变技术供给模式,激活东北产业科创引擎。具体来看:

第一,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逆向外包先进生产要素,弥补东北高端生产性服务供给的不足。东北产业发展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企占比过高(魏后凯,2017),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国企体制造成东北经济缺乏技术创新活力,二是"大而全"和"小而全"的企业模式不利于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发生。这导致东北地区产业链技术水平偏低和产业业态发育不充分(赵彪,2025),知识密集型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实现专业化发展,使东北产业竞争力难以有效提升,而逐渐降低国内市场份额。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得到缓解或解决,东北能够将缺少的知识密集型生产要素逆向发包给长三角等先发地区,弥补高端生产性服务不足的缺陷,破解阻碍产业发展的瓶颈,完善和优化产业链条,激活庞大的国有资本存量,进而形成示范效应,促使企业将技术创新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创新动力。

第二,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将东北企业纳入发达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融入产业链技术协同升级机制。东北产业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的参与度降低,使东北产业发展难以享受到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是东北地区产业链转型升级缓慢的原因之一。增长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通过产业带动和示范引领,不断推进国家整体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Perroux,1950)。在以国家增长极为引领的国家价值链中,"链主"企业掌握关键核心要素,东北企业若要深度融入这一兼具高技术含量与高效治理能力的价值链体系,必须与其进行高效的生产配套与协同,否则将面临被潜在企业替代的风险(张少军等,2013)。这种技术协同升级机制将东北企业带上产业链迭代升级的快车道,跟上经济增长极快速发展的步伐。

第三,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强化培育东北技术创新生态。根据《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2023年报告》测度,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营商环境排名分列27、22、23位,均处于全国下游水平,表明东北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可从三个方面优化东北的创新环境,其一,东北企业通过产业对接,融入增长极主导的产业链,在服务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获得"链主"型企业的创新溢出与技术迭代倒逼升级的动力。其二,运用数智网联手段,东北企业有效利用先发地区的研发、渠道、售后等缺乏的知识密集型创新要素,弥补产业链延伸中的缺失环节。其三,通过制度对接,明晰东北与发达地区创新环境营造的体制机制差距,使用对标找差等可操作手段,强化东北创新环境的制度培育。

2.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改善东北产业发展市场环境

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能够从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两个层面影响东北市场培育。横向拓展以扩张市场范围和链接国内外市场等路径壮大东北产业市场规模,纵向深化以倒逼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途径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东北地区产业链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带来首要的影响是扩展市场空间,释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深化产业链分工,此时,东北主动对接增长极过程中暴露出的制度短板成为限制市场功能发挥的瓶颈,进而通过倒逼机制,优化东北市场环境,将规模优势延展为制度优势,共同推动东北市场实现规模扩展与制度优化协同提升。具体来看:

第一,东北地区产业链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能够强化市场互动,扩大市场规模。东北地区对内开放不足导致内需规模偏低,2023年东北实际消费内需规模和潜在消费内需规模[⑦]仅达到东部沿海[⑧]的28.5%和26.3%,并呈下降趋势,同时,东北地区的内需挖掘率已达到70.1%,高出东部沿海地区近6个百分点,表明东北地区的内需开发潜力已然有

限。市场规模是产业分工与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内需不足限制了东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育空间，进而阻碍了内生增长动力的生成。东北地区产业链如能有效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为其提供中间产品或代工服务，嵌入庞大的国内生产网络，开拓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体量巨大的市场，将有效缓解市场规模对东北地区产业链成长的限制，促进内部分工和区域联动，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

第二，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东北地区产业链实现间接联通国内外市场。东北产业与国内经济循环融合不深，又难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东北衰退现象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手段为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增长极作为我国链接国内外市场的枢纽，国际贸易出口额占全国比重近七成，吸收内陆地区初级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完成外包订单。东北若能立足为增长极提供中间产品与服务，深度嵌入发达地区供应链，便可借助增长极向国内外输出最终产品的过程，间接实现对世界市场的联通与开拓。

第三，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倒逼加快完善东北的市场体制机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成功的重要经验是主动对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为了更有效地承接发达经济体的外包订单，东南沿海地区企业要积极去适应世界贸易规则和市场化要求，如此便倒逼这些地区快速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起能够有效应对发达国家贸易规则的体制机制。但由于区位、体制等因素的限制，东北地区产业链未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但通过对接国家经济增长极，主动融入国内价值链，建立与发达地区的生产关联，参与并学习其贸易规则和模式，能够有效倒逼东北的市场化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以外部推力弱化主动改革过程中的内部阻力，实现营商环境和市场机制的根本改善。

三、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实困境

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困境表现为与国内经济循环融合不深导致的产业发展缓慢问题。采用历史考察法，从市场份额、区域联动和生产网络依存度等层面递进论证融合不深的事实。

1. 东北地区产业链在国内经济循环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产业链呈现出与国内循环融合不深的现状。这一事实发生在我国地区间非平衡开放的进程[9]中，率先开放具有开展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地区，有助于带动国内经济发展，起到良性示范带动作用。事实正是如此，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取得巨大成功。通过设立特区、自贸区等政策倾斜手段，借助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优势，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吸引大量外资进驻，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充分获取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取得巨大贸易利益和长足技术进步，有效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但这也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东北向国内其他区域输出工业装备产品的国内经济循环格局[10]，导致东北地区产业链逐渐衰退（刘志彪等，2024）。

第一，东北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中的份额不断降低。使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东北工业产品（包含中间品和最终品）[11]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从市场份额数据中来观察东北地区产业链发展变化的情况。如图2所示，1987年东北生产（使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比重为13.2%（12.8%），后逐渐降至2020年[12]的3.6%（3.4%），市场份额仅为1987年的27.3%（26.6%），这表明东北工业在国内市场的重要性逐渐式微。进一步，剔除最终品，测度东北中间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份额，用来说明其在国内区域间的生产协作状况。1987年东北生产（使用）中间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为12.3%（12.1%），到2020年，该比重仅为3.4%（3.1%），表明东北在国内生产链供应链中的作用呈现出弱化趋势。

第二，东北地区产业链的区域联动不断减弱。参考Wang zhi et al.（2013）、苏庆义等（2016）学者的国际贸易分解方法和最新进展，建立分解公式，拆分东北的国内区际贸易，获取贸易增加值的组成、流动、转出等信息，探究东北地区产业链在国内区域联动中的弱化状况。表1、表2展示了东北与东部沿海的区际贸易分解结果。

下面从区际贸易增加值组成、流转和流动形式三个层次展开研究。其一，从区际贸易增加值组成上看，东北地区流出的区际贸易中，国内其他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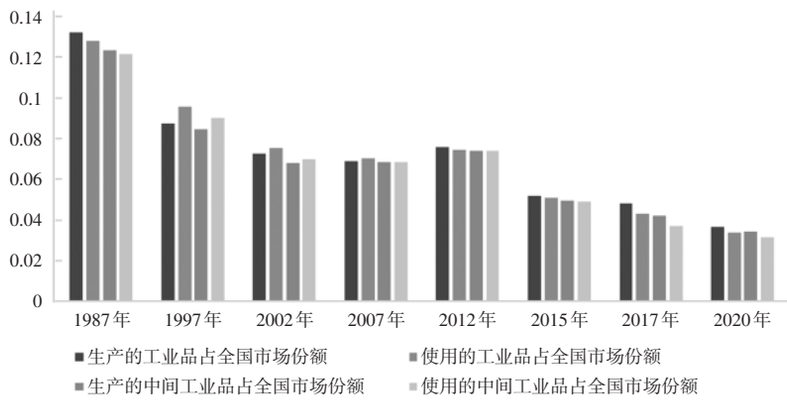


图2　1987—2020年东北生产和使用的(中间)工业品国内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绘制。

表1　1987—2020年东北地区对东部沿海的区际贸易分解

	*AV*1	*AV*2	*AV*3	*AV*4	*AV*5	*AV*6	*AV*11	*AV*12	*AV*13	*AV*111	*AV*112
1987年	0.779	0.015	0.114	—	—	0.092	0.424	0.151	0.204	0.247	0.176
1997年	0.783	0.017	0.128	—	—	0.072	0.453	0.147	0.183	0.083	0.370
2002年	0.783	0.005	0.054	0.099	0.002	0.056	0.425	0.124	0.235	0.061	0.364
2007年	0.667	0.004	0.069	0.173	0.006	0.082	0.355	0.077	0.235	0.092	0.263
2010年	0.700	0.010	0.080	0.136	0.005	0.068	0.424	0.105	0.172	0.202	0.222
2012年	0.742	0.015	0.073	0.097	0.004	0.069	0.441	0.108	0.193	0.150	0.291
2015年	0.647	0.028	0.104	0.091	0.004	0.126	0.338	0.172	0.137	0.120	0.218
2017年	0.605	0.015	0.114	0.141	0.006	0.118	0.337	0.123	0.145	0.147	0.190
2020年	0.550	0.010	0.128	0.143	0.006	0.163	0.286	0.137	0.127	0.134	0.153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0、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注:以*A*地流向*B*地的地区间贸易分解举例,解释表中指标含义。*AV*1表示流入国内其他地区(非*A*地)或国外的*A*地增加值占比,*AV*2表示流回并被吸收的*A*地增加值占比,*AV*3表示国内其他区域(非*A*地)增加值占比,*AV*4表示国外的增加值占比,*AV*5表示进口回流的A地增加值占比,*AV*6表示中间品贸易在区域间流转造成重复计算的增加值占比。进一步分解*AV*1为流向*B*地并被吸收、转出被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吸收的*A*地增加值占比,分别为*AV*11、*AV*12和*AV*13。再分解*AV*11为以最终品(*AV*111)和中间品(*AV*112)形式流入*B*地的增加值贸易占比。此外,1987、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缺乏进口数据,故表中该年份关于国外的指标*AV*4、*AV*5缺失,下表同。

表2　1987—2020年东部沿海对东北地区的区际贸易分解

	*AV*1	*AV*2	*AV*3	*AV*4	*AV*5	*AV*6	*AV*11	*AV*12	*AV*13	*AV*111	*AV*112
1987年	0.655	0.023	0.163	—	—	0.160	0.353	0.182	0.120	0.156	0.197
1997年	0.689	0.015	0.239	—	—	0.057	0.558	0.055	0.076	0.172	0.386
2002年	0.663	0.005	0.074	0.224	0.005	0.029	0.510	0.083	0.070	0.155	0.355
2007年	0.548	0.015	0.135	0.207	0.007	0.088	0.383	0.094	0.071	0.196	0.187
2010年	0.567	0.013	0.164	0.191	0.007	0.058	0.464	0.058	0.045	0.266	0.198
2012年	0.629	0.019	0.109	0.190	0.008	0.045	0.515	0.069	0.045	0.272	0.244
2015年	0.540	0.020	0.174	0.165	0.007	0.095	0.408	0.092	0.040	0.236	0.172
2017年	0.562	0.022	0.147	0.171	0.007	0.091	0.398	0.105	0.039	0.243	0.155
2020年	0.493	0.037	0.149	0.162	0.007	0.152	0.314	0.131	0.047	0.192	0.123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0、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增加值(*AV*3)和国外增加值份额(*AV*4)均显著低于东部沿海,说明东北地区产业链在国内外垂直专业化生产中的互动程度较弱,动态考察发现,这种趋势在继续。其二,从增加值流转上看,1987年以后,区际贸易中东北流向东部沿海并被吸收的增加值份额(*AV*11)逐渐低于反向贸易的该份额,说明东北

地区的价值创造能力逐渐弱于东部沿海。同时，从东北再流转到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增加值比重（*AV*12和*AV*13）少于东部沿海的情况看，东北创造的增加值流入东部沿海后增强了在国内外产业链上的互动，相反，东部沿海创造的增加值流入东北后却弱化了在国内外经济循环中的关联。其三，从增加值流动形式上看，东南沿海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东北流向东部沿海的增加值形式由最终品（*AV*111）为主变为中间品（*AV*112）为主，相反，反向贸易的增加值流动形式转变为以最终品为主，说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装备输出地地位逐渐被东部沿海替代。总之，以区际贸易的增加值组成、流转和流动形式等层面的数据结果看，均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东北地区产业链在国内循环中融合不深的现状。

第三，东北产业生产网络的国内依存度不断降低。在借鉴区际贸易分解方法的基础上，参考刘瑞翔等（2017）分解产增组成的方法，构建指标体系，考察东北地区产业链在国内外生产中的空间依存关系。将产值分解为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表示使用本地中间品、外部中间品和本地中间品溢出到其他地区诱发的产值比例。结果见表3，展示了中国四大区域[19]工业产值生产的空间依存关系。

表3 1987—2020年中国四大区域工业产值分解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1987年	0.747	0.009	0.244	0.813	0.030	0.157
1997年	0.832	0.003	0.165	0.866	0.023	0.111
2002年	0.852	0.002	0.146	0.927	0.007	0.066
2007年	0.726	0.004	0.270	0.897	0.017	0.086
2012年	0.778	0.003	0.219	0.889	0.013	0.098
2015年	0.676	0.004	0.320	0.849	0.026	0.125
2017年	0.612	0.003	0.385	0.846	0.017	0.137
2020年	0.602	0.005	0.393	0.787	0.036	0.177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1987年	0.710	0.019	0.270	0.825	0.004	0.171
1997年	0.666	0.014	0.320	0.777	0.008	0.215
2002年	0.849	0.004	0.147	0.887	0.003	0.111
2007年	0.717	0.008	0.276	0.674	0.011	0.315
2012年	0.797	0.006	0.196	0.787	0.009	0.204
2015年	0.684	0.014	0.302	0.713	0.014	0.272
2017年	0.733	0.010	0.257	0.786	0.013	0.201
2020年	0.636	0.038	0.326	0.680	0.023	0.297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通过分析发现：其一，东北地区产业链上的乘数效应在四大区域间处于较低水平，且有下降趋势，2020年降至国内最低水平，说明东北地区产业链的外部依存度过高，区域内供应链存在提升空间。其二，东北地区生产网络中反馈效应偏低，远不及国内其他地区，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外部投入品较少，产业联动偏弱。其三，东北地区产业链的溢出效应远高于东部地区，根据价值链治理理论，“链主”型企业因掌握核心技术或不可替代的关键要素等能力，拥有攫取价值的权力（Antràs，2020），故表明东北产业处于国内价值链上的工业基地地位在降低，而东部产业链在强化并居于主导地位。

进一步，分解东北和东部地区产业链的乘数效应，获取各区域诱发的增加值比重（见表4）。从分解结果中发现，东北在国内外产业链体系中表现出弱化趋势。具体说明：其一，东北产业表现出国际贸易的弱关联性，而东部地区则与国外保持较强关联。其二，东部地区在东北产业生产中表现出相对重要性，呈现出“诱发不对称”现象。

再看溢出效应的分解（见表5），发现东北与东部地区的产业溢出表现出显著的不对称现象。东

表4　1987—2020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乘数效应分解

	东北地区乘数效应					东部地区乘数效应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国外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国外
1987年	0.555	0.014	0.005	0.008	0.165	0.012	0.490	0.032	0.026	0.252
1997年	0.678	0.013	0.005	0.008	0.128	0.009	0.509	0.026	0.022	0.300
2002年	0.615	0.050	0.007	0.006	0.174	0.005	0.549	0.020	0.012	0.341
2007年	0.407	0.072	0.030	0.016	0.201	0.013	0.374	0.026	0.030	0.456
2012年	0.536	0.049	0.036	0.051	0.105	0.012	0.464	0.026	0.041	0.346
2015年	0.443	0.059	0.039	0.044	0.092	0.017	0.404	0.038	0.046	0.345
2017年	0.340	0.090	0.048	0.053	0.081	0.017	0.392	0.032	0.041	0.363
2020年	0.300	0.108	0.042	0.042	0.109	0.011	0.349	0.038	0.041	0.348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北的溢出远高于东部地区，表明东北产业容易受到其他地区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影响，却无力产生影响，即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国内产业链上的影响力在下降。利用溢出效应测算敏感度与分散度指数（见图3），发现东北地区产业链在国内呈现较高感应度和较低分散度。

从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的增长情况中，能够明晰东北在国内经济体系中地位变化的最新情况。2025年东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5万亿元[14]，占全国比重4.6%，仅为1978年的34.6%，逐年降低，同时，增速为2.7%，低于全国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15]。工业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2025年东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为5.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仅为4.1%，低于十年前的4.9%，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东北规上工企还表现出“低利润高亏损”特征，2025年利润率和亏损率分别为3.45%和2.19%，同期国内平均水平为5.31%和1.22%（见表6），与长三角等增长极比较，东北的产业增长问题更为突出。由此，可以

表5　1987—2020年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分解

	东北地区溢出效应					东部地区溢出效应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国外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国外
1987年	0.003	0.126	0.030	0.016	0.070	0.032	0.007	0.058	0.030	0.030
1997年	0.001	0.080	0.022	0.024	0.038	0.020	0.004	0.044	0.036	0.008
2002年	0.001	0.077	0.016	0.014	0.038	0.010	0.003	0.029	0.019	0.005
2007年	0.003	0.106	0.034	0.039	0.089	0.013	0.007	0.026	0.032	0.008
2012年	0.002	0.081	0.037	0.055	0.043	0.013	0.004	0.031	0.041	0.008
2015年	0.007	0.123	0.063	0.064	0.063	0.014	0.008	0.044	0.049	0.010
2017年	0.027	0.110	0.067	0.083	0.069	0.014	0.012	0.042	0.058	0.011
2020年	0.006	0.146	0.081	0.071	0.089	0.010	0.029	0.063	0.059	0.016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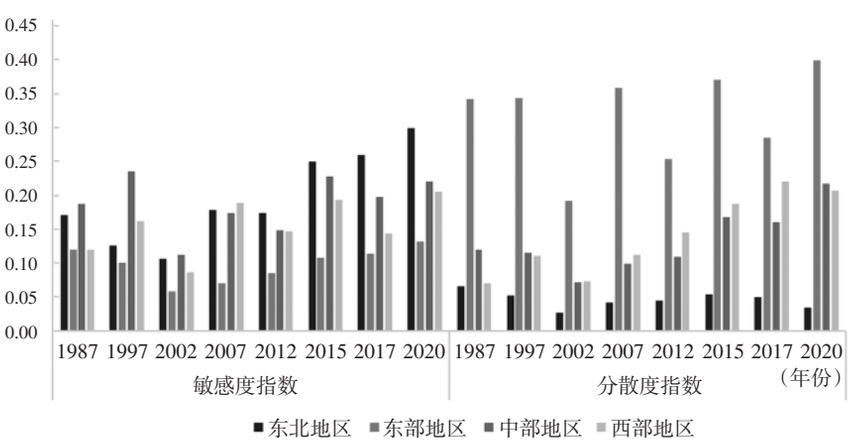


图3　1987—2020年中国四大区域敏感度指数与分散度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1987、1997、2002、2007、2012、2015、2017、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绘制。

表6 2023—2025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情况及对比

		规模以上工企营业收入(亿元)	规模以上工企利润总额(亿元)	规模以上工企亏损额(亿元)	规模以上工企利润率(%)	规模以上工企亏损率(%)	规模以上工企国内占比(%)
东北地区	2025年	57068	1969	1251	3.45	2.19	4.10
	2024年	61432	1835	1858	2.99	3.02	4.40
	2023年	64072	2859	1298	4.46	2.03	4.71
长三角地区	2025年	403795	21090	4549	5.22	1.13	29.01
	2024年	395955	20140	4795	5.09	1.21	28.35
	2023年	379774	21128	3773	5.56	0.99	27.92
全国	2025年	1391981	73982	17032	5.31	1.22	100.00
	2024年	1396450	75458	18723	5.40	1.34	100.00
	2023年	1360317	82897	15630	6.09	1.15	100.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

发现东北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在降低。

2.融入困境影响东北产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东北产业与国内循环融合不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东北与国内经济融合不深,陷入了技术衰退与市场缩减的恶性循环,导致产业发展缓慢。随着东南沿海逐渐偏向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循环(潘文卿等,2018),通过“干中学”和吸收跨国企业技术溢出,东南沿海企业生产能力得到快速增强(刘斌等,2015),对东北工业装备形成替代,直接表现为国内市场中产品份额的快速降低,其结果是工业企业营收的减少,进而,用于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也必然随之减少,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将进一步失去市场份额。从而,形成技术衰退与市场缩减的恶性循环,这是导致东北地区产业链竞争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其二,东北与国内经济融合不深,削弱了国内产业联动和规模经济效应。计划经济时期东北产业的快速崛起,除了得益于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国内的大规模建设为东北工业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关键支撑[16]。东北地区产业链与国内经济循环融合不深,造成两方面不利影响:一方面削弱了东北与国内其他区域间的产业联动,尤其是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的产品内分工联系紧密度不够,减少了获取技术先进区域溢出的机会,不利于东北嵌入增长极产业链治理体系和技术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削弱了东北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根据斯密定理,市场规模扩展有助于促使专业化分工形成和深化。东北工业品国内市场份额的缩减,不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释放,也相应弱化了产业分工和技术升级的基础和条件。

其三,东北与国内经济融合不深,错失以主动融入倒逼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重要时机。东北地区产业链没能很好链接国际市场,并呈现与国内经济循环融合不深的状况,使其形成相对封闭的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东北产业发展难以享受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和先进管理经验的溢出,也无法融入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体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主动对接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和尝试,也未主动去适应先进地区市场规则和贸易习惯,既难以借鉴到东南沿海地区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秩序过程中,为适应贸易规则而被倒逼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发展经验,又容易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机制路径依赖束缚,从而减缓了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难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施路径

东北振兴产业政策的传统手段以技术改造提升、调整产业结构等项目支持为主,然而,结果往往陷入“项目怪圈”[17]。东北经济难以正常循环,传统振兴手段可能会失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家战略提出,契合了东北与国内经济循环和全球经济循环中低嵌入度的困局,为振兴东北经济指明了方向。以顶层定规则、中层拓空间和底层强支撑为对接路径的实施原则,顶层设计以强化制度对接与大规模干部互派交流为路径引领,中层实践以强化区域合作与推进产业互动为路径载体,底层支撑以优化企业配套与倒逼市场改革为路径落实,共同构

成东北地区产业链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路径体系。

第一,构建系统化的对接制度,为对接提供引领和保障。应由中央政府牵头,设立东北对接服务国家经济增长极的专门机构,负责顶层规章制度的制定,定期组织推进区域对接事宜,并持续督导对接进程,同时,将对接实效纳入政绩考核,确保制度供给与进程管控落地。对接制度的建立应侧重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注重行政部门的有效衔接,创设"对接链长"工作机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负责人担任跨区域产业链对接链长,牵头搭建信息共享与要素匹配平台,定期组织产业链供需路演和协同攻关联盟,为东北与增长极产业链对接提供协助,维护产业链对接,协调产业链关联,促进产业链互动。另一方面,清理产业链对接的行政阻碍。对影响企业跨地区经营存在的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行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为准绳,及时予以清除。开展跨地区经营壁垒专项整治,建立异地公平竞争审查互认与投诉快速响应通道,为东北地区产业链深度嵌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无差别、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第二,建立东北与国家增长极大幅互派官员机制,以干部交流为对接提供必要助力。我国东北地区与广东、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已制定有官员互派机制,但规模较小,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东北顽固的体制机制路径依赖。在现有干部交流和区域合作基础之上,加大经济发达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干部交流力度,大幅度地互派年富力强的干部挂职学习,内化先进的施政理念,形成勇于创新发展的共识,如此,才能彻底扭转东北"等靠要"的社会风气。落地设计上,大幅度扩展交流规模,聚焦发改、工信、商务、科技等直接涉及产业对接与经济治理的核心部门,每年从东北各县市选派年富力强、有改革锐气的处级及后备干部,赴增长极的开发区、头部企业及创新型政府机构,开展实职跟岗,深度参与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数字政务运行等关键流程。将发达地区成熟的政策工具、服务标准进行本土化复制,其转化实效纳入干部考核档案。

第三,构建收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区域合作原则,为对接提供依托和保证。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逐步实现区域对接,其一,可以先从加强区域间运输能力和多式联运等基础设施对接入手,设立互联互通专项基金,按运量比例分摊建设与维护成本,压缩要素流通成本。其二,简化限制区域间人员流动的社保、落户等流程,便捷人才流通和异地办公需要,破解异地执业与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其三,完善区域间合作机制,以收益共享、成本共担为基本原则,实现持续有效的共赢合作模式,对因对接产生的税收、GDP、就业等增益,按要素贡献度与事先约定比例进行分账,对因保障生态、提供农产品等功能而受限发展的地域,实施横向转移支付。此外,应考虑到东北为新中国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发达地区应适当反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设立东北振兴反哺专项,由发达地区按比例配比资源,定向投入东北技术升级与民生。

第四,实现产业互动发展动力的制度化注入,为对接提供驱动载体。通过产业链核心环节逆向外包、设立"产业飞地"等手段实现发展动力的制度化注入,并把东北带入全球经济新分工格局中。其中,将核心环节向国家经济增长极逆向外包,需明晰东北主导产业中的技术迭代滞后、关键零部件受制等卡脖子瓶颈,反向将这些核心环节,通过定向揭榜挂帅、合同研发制造等方式,主动外包至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增长极的创新链,进行针对化对接,解决东北产业发展中的难点和堵点。另外,区域合作在东北设立"产业飞地",应由国家经济增长极头部园区或标杆企业进行主导,在东北划定的特定区域,整建制移植其规划建设、招商运营、政务服务的一整套标准化模式,将发达地区关于产业发展好的做法机制性移植到东北,重塑东北的产业生态,使其直接接轨国际规则,高效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

第五,形成与经济增长极的企业配套,为对接提供微观支撑。一方面,应发挥哈电、沈鼓等东北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优势地位,支持它们通过开放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牵头组建跨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方式,嵌入国内外经济循环,构建以东北为主的产业链体系。另一方面,利用东北大量制造企业数量优势,与东南沿海地区的"链主"型企业形成链条配套,实现优势互补。尝试多方式多渠道建立企业链接,从承接其非核心的外包订单起步,设立跨省产能协同的共享工厂或飞地生产线,以积极承接东南沿海企业外包订单的方式为其主导企业提

供生产配套，或借助承接发达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契机，构建起与增长极的微观衔接，以国有企业间的生产配套为先导，示范引领民营企业走进山海关。

第六，积极推进东北市场化改革，稳固对接的体制机制依托。核心路径在于以制度化激励引导企业主动嵌入增长极的产业链治理体系。通过财税、金融等制度设计，如设立引导基金与专项税收抵免，对东北企业与增长极链主企业达成长期配套协议、共建联合体进行研发或品牌建设的，按其跨区域交易额给予阶梯式财政奖补，将市场接轨行为转化为即期财务收益。引导东北地区企业主动对接融入经济增长极的产业链治理体系，习得市场机制，完善地区的贸易规则，适应成熟市场带来的高效运行和价值创造等好处，当企业对更优制度形成内生的适应性需求后，便会形成一股持久的市场推力，进而，从企业层面倒逼东北地区改革和完善市场体系，破除僵化的制度路径依赖困境。

注释

①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72.htm。②本文所指东北地区包含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③陈云指出："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东北跟关内有很大不同。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生产就可以恢复了。关内就不是这样，开一个工厂需要相当的时间，一般来说，从开始订机器到安装好，没有三五年时间是不行的。"④据《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记载，1951年工业基本建设工作量东北地区占比40.2%，其中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占比44.6%；1952年基本建设投资中东北地区占比接近全国的1/4，为六大协作区之首。在中央支持的大力建设下，东北的工业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恢复，到1952年底，东北工业和农业的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值的62%，工业占东北国民经济比重达到55.9%。⑤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1953—1957年间，东北生产的钢、成品钢、原油等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均超一半以上，发电量接近1/2，原煤产量超过1/3。⑥使用《新中国60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发现：2014年以来，东北工业增加值连续出现负增长，2016年东北工业企业亏损率比高达2.2%，是长三角地区的4.5倍，而利润率仅相当于长三角地区的53%，2017年工业企业亏损率高达20.7%，是长三角地区的1.73倍。⑦采用刘志彪和凌永辉（2020）对内需概念的界定，即来自国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能力。具体公式：潜在内需规模=居民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内需规模=居民人数×人均消费。下文的内需挖掘率=实际内需规模/潜在内需规模。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⑧东部沿海包含沪、苏、浙三省（市）。⑨1988年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初步融入世界经济秩序。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肯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加快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步伐。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大大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行业进入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迎来爆发式增长，逐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⑩根据《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计划经济时期东北产业的快速崛起，除得益于较好工业基础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国内经济的大规模建设为东北工业崛起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和关键支撑。⑪使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数据，下文同。⑫2020年贸易流量数据可能受到当年外部宏观环境的短期扰动。但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东北地区产业链与国内循环融合不深的结构性特征，且1987—2020年的历史趋势已充分表明这一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短期波动不影响核心结论的稳健性。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下文同。⑭中国四大区域即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北包含辽宁、吉林、黑龙江，东部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包含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包含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⑮此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名义增速，有别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实际增速，为保证与地区间产值增速的可比性，故采用名义增速。⑯根据《新中国60年》的记录：辽宁1952年到1985年全省净调出生铁3738万吨，钢材5485万吨，纯碱814万吨，水泥3998万吨，各种有色金属178万吨，输出的工业产品占到全省产量的90%以上。1953—1987年间，黑龙江向省外调出煤炭3.06亿吨，木材2.69亿立方米，原油7.25亿吨，粮食6475万吨，发电设备2398万千瓦。以及大量的冶金设备、矿山设备、机床、货车、钢材、铝材、轴承、仪表、工具等、重工业产品和糖、纸、乳、麻等轻纺工业品和羊毛、油料、烤烟等农副产品。吉林在汽车制造、石油化工、能源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等方面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相关物资和设备。⑰东北振兴的支持项目投产后出现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继而再接着上项目，形成"项目怪圈"。这不仅浪费大量专项资金，耽搁东北振兴机遇，加深东北经济的衰退。

参考文献

[1]Antràs P. 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20,34(3):511-574.

[2]Koopman R, Powers W, Zhi W, 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s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J/OL]. NBER Working Paper, 2010: w16426. https://doi.org/10.3386/w16426.

[3]Perroux F.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64(1):89-104.

[4]Wang Z, Wei S,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J/OL].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w19677. https://doi. org/10.3386/w19677.
[5]陈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要思考的几个关键问题[J].经济纵横,2017(1):8-12.
[6]戴枫,刘志彪.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J].经济纵横,2024(5):79-86.
[7]和军,刘勇.东北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与突破路径[J].学术交流,2025(7):112-128.
[8]李培林.理解与应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南北差距[J].社会发展研究,2022(1):1-14.
[9]林木西,丁柯文,王璐.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实践研究[J].求是学刊,2024,51(5):69-78.
[10]林毅夫,付才辉.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吉林振兴发展研究:《吉林报告》分析思路、工具方法与政策方案[J].社会科学辑刊,2017(6):5-20.
[11]刘斌,魏倩,吕越,等.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J].经济研究,2015,51(3):151-162.
[12]刘瑞翔,颜银根,范金.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7,52(5):89-102.
[13]刘志彪,凌永辉.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管理世界,2020,36(7):15-29.
[14]刘志彪,仝文涛.价值链视域下全面推动东北产业链嵌入国内外市场大循环[J].学习与探索,2024(2):82-89.
[15]刘志彪,仝文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1):36-43.
[16]潘文卿,李跟强.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J].经济研究,2018,53(3):171-186.
[17]苏庆义.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J].经济研究,2016,51(1):84-98+113.
[18]仝文涛,刘志彪.经济循环、价值链重构与东北工业振兴[J].经济科学,2024(1):62-84.
[19]王小鲁,樊纲,李爱莉.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2023年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20]魏后凯.东北经济的新困境及重振战略思路[J].社会科学辑刊,2017(1):26-33.
[21]杨开忠,王媛玉,胡校.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的空间经济基础[J].经济纵横,2021(10):11-22.
[22]张少军,刘志彪.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J].经济管理,2013,35(8):30-40.
[23]赵彪.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症结与着力方向[J].区域经济评论,2025(1):55-61.
[24]赵祥.准确把握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J].中州学刊,2024(8):22-30.
[25]赵杨,张慧.中国东北地区多维分化的困境、成因与协同振兴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25(4):170-179.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Northeast Industrial Chains into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 Perspective on Aligning with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Tong Wentao　Zhang Pengyuan　Liu Tian'en

Abstract: The weak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nto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revitalizing its economy.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to integrate into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the effective lever is to align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From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by which the industrial chains of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aligning with and serv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revitalization. On the supply side,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enables the reverse outsourcing of innovation factors and the embedding of the industrial chains into production-supporting collaboration, thereby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mentu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Northeast industries. On the demand side,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links the region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compels the advancement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thereby expanding the market scale and improving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In turn, a mutually reinforcing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arket takes shape, adv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industries. The paper furth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volution of market shares, interregional trade linkages, and production network dependence, the fact that Northeast industries are weakly integrated into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weak integr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on multiple dimensions—institutional guidance, market reform, regional cooperation, industrial interaction, enterprise supporting collaboration, and cadre exchanges—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Northeast industrial chains into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Northeast Industrial Chains;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Pole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责任编辑:墨　衡）